

吴承恩和《西游记》

王 俊 年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承恩和《西游记》

王俊年

北京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为了帮助工农兵读者阅读我国古典小说而编写的。

《西游记》是一部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神话小说，它以描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的故事，曲折地反映和歌颂了我国劳动人民蔑视神权，反抗压迫，坚决向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同时也表达了我国劳动人民征服自然和战胜困难的伟大理想和信心。本书分五个部分，分别对小说的成书过程、时代背景、作者的生平思想，小说描写的内容和艺术特色，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论证，对书中的封建性糟粕，作了认真的批判。

吴承恩和《西游记》

王 俊 年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30,000字

1973年11月第1版 197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册

书号：10071·66 定价：0.12元

目 录

- 一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1
- 二 《西游记》成书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生平思想..... 5
- 三 《西游记》描写的内容和它的社会历史意义.....12
- 四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25
- 五 《西游记》消极成分批判.....41

毛主席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①又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②毛主席的指示，既充分肯定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成就，又为我们提出了整理、阅读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指导思想，当然也是我们阅读、研究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的指导思想。

一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西游记》是一部杰出的、最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神话小说。它的产生过程，和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相类似。它的基本故事很早就民间流传。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许多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的创造、增删、修改、加工，故事不断丰富、发展和扩大。在人民创作的基础上，最后经过吴承恩的取舍、组织、加工、再创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五八五页。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同上书，第六六七——六六八页。

造，才成为现在这样一部为中国人民所熟悉和喜爱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的主要篇幅是写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降妖伏魔，扫除障碍的故事。

唐僧取经，本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有一个名叫玄奘的青年和尚，独自一个人赴天竺(印度)取经，花了十七年的时间，经历了在当时来说是一百多个国家，走了几万里路，吃尽了千辛万苦，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当时，这件惊人的举动，曾震动中外。归国后，玄奘组织译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并奉诏口述沿途见闻，由门徒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以后他的门徒慧立、彦琮又写了一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这本书里，慧立、彦琮为了夸大师父的业绩，扩大佛教的影响，在描写玄奘不避艰险，坚决西行的同时，还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不过它们还游离于取经故事之外。取经故事的真正神奇化是在它流入民间以后，无名作者按照自己的思想愿望和艺术兴趣加以改编、丰富、发展，以至离开历史上的真实事件愈来愈远。

“说话”艺术兴起以后，说话人用它作为题材，进行再创造。现存的南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经开始把许多神话传说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并且书中出现了猴行者和深沙神(这当是后来《西游记》中孙悟空和沙僧的前身)，也写了一些阻挠取经的妖魔和其他奇遇。但它的体裁类似唐朝、五代流行于民间“讲唱经文”的“俗讲”，诗歌的性质近

乎佛经的偈赞，话文的叙述极其简单粗糙。有些故事如孟氏杀子等，荒诞不经；某些细节如蟠桃变幻、虎精破腹等又都不近情理；宗教迷信的色彩也很浓厚。不过，它毕竟已经勾勒出了取经故事的大概轮廓。从猴行者、女人国等的描写上，也依稀可以看到后来《西游记》某些章节的雏形。

取经故事到元代有了更大的发展。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送”韵“梦”字条下引有标明《西游记》的“梦斩泾河龙”一段文字（约一千二百余字），内容和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即一九七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本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吏”的前半部分基本相同。所不同的，主要是小说把“梦斩泾河龙”里的两个渔翁改成了一渔一樵，并增加了大量的诗词和人物活动的描写。从这种情况来看，至迟在元末明初已经有过一部类似平话的《西游记》了。另外，在古代朝鲜的汉、朝语对照读本《朴通事谚解》中，也载有引自《西游记》平话的“车迟国斗圣”一个片段，是根据原文简括改写了的，内容和百回本《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十分相似。书中还有八条有关的注，叙述了取经故事的梗概。其中谈到法师去西天时一路上所遇到的毒蛇猛兽之害、妖魔精怪之患、恶山险水之阻等等情节，所写的孙悟空的身世、经历，已经和吴本《西游记》相当接近；《取经诗话》中的深沙神已经演化成了沙和尚；并且出现了《取经诗话》中所没有提到的黑猪精朱八戒。从这里可以看到取经故事本身已经相当丰富复杂，后来百回本《西游记》中

的重要情节，在这本平话式的《西游记》里，大体上都已具备。

取经故事除了在话本中不断发展外，还搬上了舞台演出。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可惜都已失传。现存有元末明初人杨讷所著的《西游记》杂剧，共六本二十四折，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后面有收孙行者、收沙僧、收猪八戒、女人国逼配、火焰山借扇、取经归东土、行满成正果等情节。但结构很不均称，孙行者的形象还不突出，猪八戒、沙僧几乎没有性格，而且充满了佛理的说教和庸俗的插科打诨。

取经故事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是吴承恩。他集中了在民间长期流传的有关取经故事的神话和传说，总结了西游故事在平话和杂剧中发展的成就，把这些故事加以综合，重新组织、连缀、扩充、加工、润色、改写和再创作，使它围绕着主题，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经过吴承恩的辛勤劳动再创造的《西游记》，比起以前的一切取经故事来，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上，都大大提高了一步，这最突出地表现在：《西游记》充实、概括了更为深广的社会现实内容，把一个原以弘扬佛法为主的取经故事，改造、提高成为具有深刻的主题思想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的神话小说；大大加强了孙悟空这个体现人民理想的英雄人物，把他从不很重要的陪衬地位上升为全书最突出的中心人物加以赞扬，而把原来作为正面典型称颂的唐僧降到次要地位，并在很多方面给予了严峻的批判；克服了过去偏于叙述故事，缺乏性格描写的缺点，大大加

强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渲染，把过去只是粗具轮廓的人物写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把原来枯燥无味的战斗场面写得妙趣横生，绘影绘声。

这样，就使吴承恩的这部《西游记》成为神话小说中超越所有前人的优秀作品。

二 《西游记》成书的时代背景 和作者的生平思想

吴承恩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的神话小说，是有他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因素的。

朱元璋篡夺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以后，建立了高度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明王朝。

从朱元璋开始，明初的统治者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为了巩固新建立起来的封建帝国，在元代残暴统治所造成的中国社会经济严重破坏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的措施，如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军屯以及解放工奴、简约商税、扶持工商业等，因而使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曾一度出现比较繁荣的局面。但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了明代，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社会的一切腐朽性，从各个方面严重地暴露出来。极端的君主专制制度，造成了封建社会政治上的更加腐败和黑暗。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更趋于腐化堕落。许多昏庸暴虐的皇帝滥施淫威，穷奢

极欲；宦官窃权专政，胡作非为；特务横行，道路以目。如武宗在位十六年，一次也没有召见大臣。他除了在宫内奢侈淫乐外，还四出巡游，所到之处劫掠财物，抢夺妇女，以至“市肆萧然，白昼闭户”。有一次他要到江南游玩，朝臣一百零七人因谏阻被罚跪午门五日，五日后，又各责杖三十；继起谏阻者受杖四十、五十不等；先后被廷杖者一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的任意责打和诛杀大臣，比起武宗来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迷信道教，整天炼丹学道，祈求长生，在位四十多年，竟有二十多年不理朝政。很多权贵与道士勾结在一起，同恶相济，荼毒生灵。宦官和宰相把持朝政，勾心斗角。严嵩父子专权二十多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嘉靖末年，社会上已经呈现出一个政治败坏、经济破产的局面。到了万历中期之后，以神宗为首的上层统治集团更加腐朽不堪，吏治腐败达到极点，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也达到极点，社会阶级的矛盾愈趋尖锐，明王朝已经进入覆灭阶段。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是明代经济发展中的新因素，也是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末期的特征。明代的手工业和商业空前地发展，不仅纺织、冶铁、造船、制盐等手工业生产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就是以前不很发达或根本没有的行业如造纸、印刷、制糖、轧绵等也有了迅速的成长。这时，手工业工场大量出现。比如苏州城里，东北半个城尽是经营丝织业的手工业工场和手工业作坊。全市织工、染工至少都在几千人以上。吴江县盛泽镇上甚至有人家在十年间由一张织机的小户扩展成三、四十张织机的

大户。松江是棉织业的中心，商人到市里做生意的，“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商品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刺激了官僚、地主，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及其皇亲贵戚们对于奢侈品的追求。农产品的商品化更引起这些人对土地的疯狂掠夺与兼并。他们侵占官地、强夺民田，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杀人夺产，弄得“农商交困”。在这种破产流亡，无法生存下去的情况下，人民都纷纷起来反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相继出现。成化（宪宗）年间已有刘通、李原等领导的流民暴动，起义群众达到一百多万。武宗时，农民起义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斗争十分激烈，几乎倾覆了明王朝的统治。例如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暴动，自畿辅（北京附近）攻入山东、河南，转进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纵横数千里，历时三年之久。与此同时，江西、四川、河南、福建、广州等处的农民起义也彼伏此起。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的激化，引起了统治阶级内部某些人产生改良政治的愿望，也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同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更形扩大，开始逐渐破坏封建主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市民阶层的力量不断增长，市民意识日益抬头——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出现所产生的要求民主平等、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意识，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反映出来。

随着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反动，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这时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们或显或隐、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其中有的描写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情况，有的反映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有的通过历史题材猛烈地抨击当时的社会丑恶和黑暗，有的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热情地歌颂反对封建礼教和追求婚姻自主的要求，有的曲折地揭露、讽刺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有的直接表现民主平等、个性解放等市民的思想感情。由于这些作品表达了当时时代的先进思想，因而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进步文人的支持。而且小说、戏曲的形式比起正统的诗文来要自由、活泼，更适宜于反映当时丰富、复杂的生活，特别是语言的通俗、浅近，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加之这时印刷术的空前发达，又为它们的广泛流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但是，《西游记》的出现，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还有作者的一些个人的条件。

吴承恩（约公元一五一〇——一五八二年^①），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出生在一个由仕宦世家没落为小商人的家庭里。他的先世原是江苏涟水人，后来迁移到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县）。他的曾祖吴铭，当过余姚地方的训导；祖父吴贞，是仁和县的教学。虽然两代都是主管教育等工作的“学官”，但职位都不高。到他的父亲吴锐的时候，家

^① 关于吴承恩的生卒年月，由于缺乏资料，至今还没有考定。今据吴承恩《石鼎联句图题词》和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稿叙》推算，吴承恩约生活在一五一〇——一五八二年左右。

境便已十分困窘了。吴承恩在《先府君墓志铭》里说，因为家贫，他父亲超龄了好几岁才上学；入学后，又因为不能按时交钱献物，社学先生“不教先君书”，他父亲只能“从旁听窥”。他的父亲很用功，不管大寒酷暑、下雨天晴，都坐在家里读书，而且读的书很广泛，“自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吴承恩无疑会发生重要的影响。

吴承恩在少年时代就以文名冠于乡里。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中说，吴承恩自幼年起，即以“文鸣于淮”，登门向他请教的人很多。天启年间修的《淮安府志》说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诸剧，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后来清代的《山阳县志》和《山阳志遗》也都说他“英敏博洽，为世所推”，“凡一时金石碑版、餽祝赠送之词，多出其手”。但是在那个八股取士的黑暗的封建社会里，象这样一个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却被压抑着。他屡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直到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年），中年以后才补得一个岁贡生^①。他曾经到北京明王朝的吏部应选，但是没有被选上。当时，他写了一首《庚戌寓京师迫于归志呈一二知己》的诗。诗的开头就说：“世味由来已备尝，鸥心宁复到鸕行。”他把自己比作飞翔在江湖上的鸥鸟，说象他这样闲散惯了的人，哪里还能参加到朝官的行列中去！他悔恨自己不该来到这样的地方，以至尝尽了官场的炎凉。后来因为母老家贫，不得已

^① 岁贡，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每年从府、州、县学中选送去京师国子监肄业。这种办法，大都挨次升贡，用不着考试，因此又叫做“挨贡”。

去作了长兴县丞。在任不过一、两年，“耻折腰，遂拂袖而归”（天启《淮安府志》）。以后曾到金陵（南京）谋事，又一度寄寓杭州，都无所施展。晚年回到乡里，放浪诗酒，进行文学创作，在家十余年就去世了。吴承恩长期过着一种卖文自给的清苦生活。他一生的创作极为丰富，但由于家贫，又没有子女，以致大部分都散失了。现存的作品，除了《西游记》外，还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四卷。这存稿，据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里说，不过是“存十一于千百”而已。

吴承恩的父亲是个卖“采缕文縠”（即花线、绉纱之类）的小商人。小商人在当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吴承恩在《先府君墓志铭》中曾记述了他家受到官府吏胥敲诈的情况：每当乡里有赋役要出钱的时候，他父亲总是首先把钱准备好了等着。吏胥到后说要加倍，他父亲就加倍；说要再加一倍，就再加一倍。……吴承恩虽然竭力把自己的父亲写成当时社会的安分良民，但也掩饰不住他内心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之情。他父亲的“好谭时政，意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也正是当时小商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着封建统治阶级压抑的反映。吴承恩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思想上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影响。

关于吴承恩的思想，由于缺乏资料，很难作全面考察。从《射阳先生存稿》来看，吴承恩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他主张行“王道”，施“仁政”，纳忠移孝，求贤授能，提倡明白的申告劝戒、振刷典章法度、除去苛细的政令刑法、省减不必要的开支，使百姓得到休息，国家承平无事。他

所向往的是被理想化了的三代、两汉之治的社会，他所推崇的是被美化了的文、武、周公之治的政治，他所热烈希望实现的也是恢复这种所谓三代“德治”的“古道”。他企图以此来帮助明王朝的统治，维护封建秩序，挽救封建制度的没落。所以，他一方面在《明堂赋》和有些诗、文里写了些对当时明世宗王朝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庸俗无聊的文字；另一方面又对他当时所处的腐朽、黑暗透顶的明王朝的现实很不满意。由于他家的社会地位以及自己在科举道路上所受到的挫折，由于他有才能而不得任用，有希望作一番事业的大志而不能施展等坎坷不平的遭遇，使得他与封建统治阶级的距离越来越大。加上他那疾邪恶、喜质直、傲岸倔强、豪放不羁的性格，更不能容忍当时那种严酷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他面对着“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欺伪之术日繁、“奸诈之风日竞”（《赠卫侯章君履任序》）的社会现象，沉痛地发出了“近世之风，余不忍详言之也”（《送郡伯古愚邵公擢山东宪副序》）的感慨。他在一首名叫《二郎搜山图歌》的诗中热情地赞美了捉妖缚怪的二郎，对于当时明王朝宠用那些到处横行不法，残害人民的“四凶”、“五鬼”，表示了异常的愤慨！他很想拿起“斩邪刀”来诛灭这些丑类，但是“欲起平之恨无力”。政治抱负不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于是他便把自己对黑暗现实的强烈不满，把自己的济世匡时、锄暴安良的政治理想和热情，倾注在《西游记》这部文学作品之中。从《西游记》这部作品看，特别是从作品所创造的孙悟空这个形象看，吴承恩的思想，已经明显地越出了儒家思想的轨道。

吴承恩从幼年起，就爱好神奇的故事传说。他在《禹鼎志》的自序中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呵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因此，他具有丰富的民间神话和传说的知识，能够成功地运用神话题材来写作。不仅如此，他还有着明确的创作意图。他在《禹鼎志》的自序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这说明他的短篇志怪小说《禹鼎志》并不是为写鬼而写鬼，而是通过写“鬼”的形式，记“人间变异”的内容，是寓有鉴戒意味的。此外，他的《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诗作，也都表现了借神话传说，寄托驱邪除恶、“经国”“宁民”的理想。所有这些，不仅它们的浪漫主义风格可以和小说《西游记》相印证，而且从它们的思想内容方面，也可以看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意图。

三 《西游记》描写的内容和它的社会历史意义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总是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出一定社会的某些本质的东西。《水浒》的作者施耐庵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直接描写了我国历史上“官逼民反”的轰轰烈烈的北宋农民起义；《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则以

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过幻想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和歌颂了劳动人民蔑视神权、反抗压迫、坚决向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揭露和抨击了作者所处的封建社会的丑恶现实，同时也表达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征服自然和战胜困难的伟大理想和信心。

《西游记》的这种深刻的主题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孙悟空这个战天斗地、横扫世间一切妖魔鬼怪的英雄形象上面，而具体的则从他的“大闹天宫”，从他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时，一路上与各种妖魔进行出生入死的激烈战斗中表现出来。

小说一开头，就描写了孙悟空“石破天惊”的不平凡的诞生。接着就写他带领群猴，自由自在地过着那“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的生活。他不能忍受任何压迫和不平。当他考虑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的时候，竟不远万里，泛海越岭，访师求道；待学得一身本领以后，就闯入龙宫，向龙王索取宝盃、金箍棒，进而抡棒打入冥府，一笔勾销了生死簿上全部猴类的名字，从而能够“躲过轮回，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但是，统治阶级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的。龙王、阎王当面对孙悟空无可奈何，等孙悟空一走，便立即向他们的主子——神界的最高统治者玉帝告状。玉帝“遣将擒拿”不成，便使出诡计：“降旨招安”，把孙悟空骗上天庭。神的王国，是最高统治势力的象征，它有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但是孙悟空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根本不承认它的任何权威。太白金星奉旨请他上天，他“把个金星